

恩格斯论散兵战术的产生

□ 申红心

恩格斯高度重视军队战术问题，认为正确的战略战术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在《军队》等文中，恩格斯多次对战术发展进行考察，尤其是对散兵战术的产生着墨颇多。恩格斯关于散兵战术产生的论述，既反映了他对散兵战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术形态的深刻认知，也蕴含了他对战术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观点和看法。透过恩格斯对散兵战术产生的分析，能够加深我们对战术演变问题的认知，为当下军队战术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技术的突破是散兵战术产生的前提。恩格斯认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没有武器装备的发展进步，战术的根本性改变就难以成为可能。在散兵战术出现前，武器装备的状况决定了现实的战术选择。“重炮兵由于炮架质量不好而又笨重，组织也不完善，所以运动仍然十分缓慢和不灵活”，占领阵地后虽然有时可以向前变换阵地，“但不能作任何机动”；1700年后逐渐被大多数军队采用的燧发枪“射击仍然进行得很慢，兵士在整个会战期间通常最多能发射二十四到三十六发子弹”，并且枪支的瞄准依然是个障碍，射击的精度较差。与之相适应，线式队形就成为当时战术的最优选择，因为它发挥了步兵火力以及骑兵攻击的最大效力。但随着两项重要技术的突破，构成了散兵战术诞生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这两项技术的突破赋予了军队更大的运动性和独立性，立即引起了作战方式的变动，使散兵战成为可能。由此，恩格斯进一步得出了关于技术和战术关系的重要论断：“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

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兵士成分变化是散兵战术产生的重要条件。恩格斯指出，在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等发展中，“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在分析散兵战术产生时，恩格斯专门强调，散兵战术是“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在散兵战术产生之前，线式战术是“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这是因为“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他们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只有整齐运动、缺乏变化的线式队形才能保证军队在战斗中不会溃散。而随着兵士成分的改变，这种运动中对兵士的控制变得不再必要。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而法国革命中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群众”有着明确的参战目的，具备雇佣兵所没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得散兵战术的发展成为可能。

兵士的战争实践是散兵战术诞生的直接动力。恩格斯从不讨论纯粹的战术公式，而是将战术置于具体的战争之中进行考察。在恩格斯看来，散兵战术的产生有赖于兵士在战争实践中的主动创造与探索。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并不具备与英军在平地上以线式队形进行对抗的能力，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并没有像“英军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坦的开阔地上按照军事礼节的一切规定，以缓慢的步伐同他们跳熟习的战斗舞”，而是发挥了

自身特长，“把敌人引入稠密的森林，使敌人长列的行军纵队暴露在分散的、隐蔽的散兵的火力之下。他们分散成许多分散的兵群，利用每一个天然遮蔽物打击敌人”。这种被迫的探索及其结果，无疑说明了散兵战术“在一定场合，特别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比线式队形显得优越”。这种对战术不自觉的探索并非美军独有，而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欧洲各国军队之中。如将线式队形发展到极致的普鲁士军队，在圣普里瓦作战时，普鲁士近卫军试用连纵队战术，在经历巨大伤亡后放弃了这种新的战斗队形，并且“以后把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普鲁士的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散兵战术正是源于兵士们在战争中不自觉的行为，而事实说明，“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恩格斯关于散兵战术产生的论述，集中阐述了这一过程中的技术突破、人员变化的影响以及战争实践的推动，突出反映了战术演进中人与武器的互动规律。武器装备的关键突破要辅以相应的人员素质改变，并在现实战争实践的引导下才能实现军队战术的关键跃升。因此，当前军队战术发展要兼顾人与武器的均衡发展，注重在实践中探索方向。



方志敏：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军事

□ 万晓庆



方志敏（中）在狱中

扎机关的地方，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地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在树林里、岩石下或水沟里的茅蓬里去住”。1928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对磨盘山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对磨盘山大举进攻。危急之下，连队领导在一个叫方胜峰的和尚庙里开会讨论对策。会上有人提出放弃根据地、埋枪分散逃跑的主张，方志敏坚决反对。最终，方志敏说服了大家，确定了反“围剿”和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方胜峰会议3天后，红军即击溃了弋阳靖卫团的进攻，取得金鸡山战役的重大胜利。金鸡山大捷，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局

部“围剿”，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红军队伍乘胜发展，兵力增为一个团。从此，对敌军事斗争与根据地政权建设相辅相成，军事力量由团扩大到军，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横跨闽、浙、赣、皖四省边界，拥有近50个县，中心地区人口达百万之多，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形成了毛泽东盛赞的“方志敏式”根据地武装割据的大好局面。

重视军事教育

弋横起义的农民革命团主要由农

一跳够得着的目标，让官兵有奔头有收获，在小收获中累积大成就。要发挥层级作用，及时“变压”“调频”，使上下连贯一致、平稳对接，防止官兵在陡升陡降中产生厌烦逆反心理，给工作增加阻力。着力杜绝图出彩乱出力的现象。就是要端正政绩观，靠实干说话，凭实绩进步，不能把所谓政绩建立在官兵额外付出，甚至是痛苦之上。遵从部队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防止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最终劳民伤财，失了兵心。真正“爱惜民力”，防止图出名挂号，搞层层加码，热衷于出亮点、出特色、出成绩，忽视实际承受能力，使官兵疲于应付，伤了兵意。着力杜绝要求略诉求的现象。想让马儿跑得快，不仅要“加鞭”，还要“加料”，“一名善下的将军，总能喝到祝捷的美酒”。正视官兵的现实困难，理性对待官兵出现的问题，不能有反感厌恶心理，甚至贴上“问题人”的有色标签，搞“一棒子打死”。帮助官兵解决难题，把官兵诉求当成信任重托，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要想方设法办好，决不能置之不理，逃避应付，推掉责任的同时推开信任。

解决“亲疏有别”的问题。古人常言道：“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带兵之道也是带心之道，带兵管部队也要用人格魅力去凝兵心、聚兵气，真心实意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防止出现貌合神离、上下两张皮等问题。多点真心。对待官兵感情要百分之百纯洁真挚，来不得半点虚假。带兵人坦荡磊落、言行一致，投入真感情，才能感染带动战士。始终与战士同坐一条板凳、同吃一锅饭菜，真诚感受其心跳、号准其脉搏、知晓其需求，特别是为官兵帮难解困方面，千万不能搞敷衍搪塞、矛盾转移，把送上门的工作拒之门外，让官兵在“期望”中“失望”。多点诚心。“心贵乎诚”，待之以诚方能收之以真，特别是对问题多发、不服管教，甚至顶撞上级领导的“刺头兵”“问题兵”，要主动放下架子、抹开面子开诚布公地谈心沟通，不能一味挑顺眼的管、找老实的带，要知道“烈马”多为“良驹”。多点耐心。对官兵反复出现的问题，要抱以宽容和包容之心，以妈妈心、婆婆嘴、闲

不住的两条腿的耐心态度来应对解决，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使长劲，防止心浮气躁、一点就爆，久而久之在问题反复中失了耐心、乱了方寸，更让官兵心生畏惧、望而却步。多点细心。“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融洽官兵关系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善于见微知著，经常观察了解官兵的言行举止和情绪变化，综合掌握官兵家庭、婚恋、交往、工作等多方面信息，时时加以分析研判，为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做好铺垫，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多点信心。自信是成功的助推剂，遇到困难挫折要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宏大气概，困难拦路当磨练，挫折面前不低头，决不能遇挫则馁、一蹶不振，甚至陷入自暴自弃的死循环，始终信任官兵，始终保持自信。



如何打胜仗，政治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共同提高。

军校的教学方式不断改进。刚开始，学员们全部的学习和训练都在军校，后来则改为在校学习训练与部队实际战斗相结合，学员先在军校学习训练三个月，再到部队实习一段时间，最后回军校集中交流和总结提高。经过这样的改进，学员们加强了实际军事锻炼，一毕业就能上前线。吴克华曾是红五分校学员，他回忆：“我们直接体会到打击敌人的味道，也看到了干部实际指挥战斗的情形。”在军事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增长指挥才干，从而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重视斗争经验总结

方志敏善于从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向中央、省委的报告中他注重总结，被俘入狱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将此写入了狱中文稿。方志敏的思考总结全面而深入，从组织到保障、从战役到战术等等都有涉及。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赣东北红军总结过许多有效的战术并冠以通俗易懂的名称，如“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其中“吃补药”是指用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袭击敌人的小型弹药库，二是袭击孤立的小股敌人。这种战斗规模小，要求速战速决，搞到枪支弹药就走。方志敏的这些军事实践探索与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谋而合。

从1928年2月建立起正规军队到1930年7月成立红十军，仅用两年多时间，方志敏在对敌斗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学习军事、壮大红军。1933年1月，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调入中央苏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